

古希腊德育思想与中国儒家传统德育思想的对比研究

张成艳

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 2025年8月24日; 录用日期: 2025年9月23日; 发布日期: 2025年9月26日

摘要

德育, 作为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 涵盖了人类道德情感、道德知识以及道德行为的培养。古希腊和中国儒家的德育思想在各自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孕育和发展, 虽然其核心目标都是培养具备美德与道德责任感的公民, 但在教育理念、方法和价值观上却有所不同。古希腊德育思想以理性与个体自由为核心, 而儒家德育思想则更加强调社会和谐与家庭伦理。通过对比古希腊和儒家德育思想, 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两种传统的文化特征, 也能从中汲取当代教育改革与道德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

德育思想, 儒家, 古希腊, 对比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ncient Greek Moral Education Thought and Traditional Confucian Moral Education Thought in China

Chengyan Zhang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Received: August 24, 2025; accepted: September 23, 2025; published: September 26, 2025

Abstract

Moral education, as the core component of education, covers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 moral feelings, moral knowledge and moral behavior. The moral education thought of ancient Greece and Chinese Confucianism was conceived and developed in their respectiv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Although their core goal was to cultivate citizens with virtue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they

were different in educational ideas, methods and values. The ancient Greek moral ideology centered on rationality and individual freedom, while the Confucian moral ideology emphasized social harmony and family ethics. By comparing the moral education thought of ancient Greece and Confucianism, we can not only better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wo traditions, but also draw inspiration from the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form and moral education.

Keywords

Moral Education Thought, Confucianism, Ancient Greece, Comparative Study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德育作为塑造个体价值观、道德观与社会责任感的重要途径，其重要性愈发凸显。在世界文化的长河中，古希腊德育思想与中国儒家传统德育思想犹如两颗璀璨的明珠，各自散发着独特的光芒，深刻影响着东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古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摇篮，其德育思想奠定了西方道德教育的基石。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们，围绕着正义、智慧、勇敢、节制等美德展开深入探讨，构建了一套逻辑严密且富有思辨性的德育体系。他们强调通过理性思考、辩证法以及对知识的追求来培养个体的道德品质，认为只有具备知识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善，并做出符合道德的行为。这种对理性和知识的尊崇，为西方德育思想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后世西方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在中国，儒家传统德育思想历经数千年的传承与发展，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到孟子的“性善论”，再到荀子的“礼治”主张，儒家思想逐步构建起一个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价值观，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的宏大德育体系。儒家强调通过道德教育来培养个体的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注重家庭伦理与社会秩序的和谐统一。在儒家看来，个体的道德修养不仅关乎自身的完善，更是实现社会稳定与繁荣的关键^[1]。例如，孔子倡导“克己复礼”，要求人们克制自己的私欲，遵循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礼仪制度，以达到“仁”的境界。这种注重个人修养与社会和谐的德育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凝聚和引领作用，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

本文采用比较哲学的方法，在跨文化的视角下，将古希腊与中国儒家德育思想置于同一研究框架，揭示古希腊与中国传统德育思想核心理念以及二者存在的共性与差异。比较哲学不仅强调对思想体系的历史语境理解，更注重在差异中发现对话与融合。本文以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德育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因其奠定了西方德育思想的基本框架；同时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家的礼义思想为参照，因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核心。研究聚焦于“美德”与“礼义”等核心概念的比较分析，因为这些概念既是东西方德育体系的价值核心，也是其展开德育实践的基本逻辑起点。通过对古希腊和中国儒家传统德育思想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汲取两者的精华，为当代德育实践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古希腊德育思想中对理性思维和批判性精神的培养，能够帮助我们引导学生在面对各种信息时，保持独立思考和辨别是非的能力；而中国儒家传统德育思想中对家庭伦理、社会责任感以及道德修养的重视，则有助于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社会担当意识。通过比较研究，还能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

解与尊重。正是这种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有益尝试，它能够为我们搭建起一座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让我们在相互学习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当代德育体系。

2. 古希腊德育思想剖析

(一) 代表思想家的德育理念

(1) 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

苏格拉底作为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与教育家，其“美德即知识”的观点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德育思想的星空中熠熠生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且持久的影响。在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雅典社会面临着道德滑坡、价值观念混乱等诸多问题，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过程中，逐渐迷失了道德的方向。苏格拉底深刻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只有通过知识的引导，才能让人们重新找回道德的准则，实现灵魂的救赎。

在苏格拉底看来，知识并非仅仅是对事物表面的认知，更是对事物本质和内在规律的深刻理解。他认为，美德是一种关于善的知识，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到什么是善，才能做出符合道德的行为。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诚实是一种美德，就可能会在不经意间说谎；而当他真正理解了诚实的价值，就会自觉地选择诚实。苏格拉底将智慧、正义、勇敢、节制等美德都归结为知识。他认为，智慧是一种能够辨别是非善恶的知识，拥有智慧的人能够在复杂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判断；正义是一种关于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知识，它要求人们在与他人交往中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勇敢并非是盲目地冒险，而是在面对危险时，凭借对善恶的正确认识，坚定地选择正确的行为，这其中蕴含着对理性知识的运用；节制则是对欲望的合理控制，需要人们具备对自身需求和欲望的正确认知，这种认知也是一种知识。

苏格拉底的“产婆术”，作为其独特的教育方法，在德育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婆术”基于苏格拉底对知识的独特理解，他认为知识并非是从外部灌输进入的头脑中的，而是人们内心原本就存在的，只是需要通过适当的引导和启发才能被发掘出来。就如同接生婆帮助产妇将婴儿从母体内接生出来一样，教师的作用就是帮助学生将内心的知识“接生”出来。在与学生的对话中，苏格拉底通常会以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开始，引导学生思考。当学生给出答案后，他会进一步提出问题，对学生的回答进行质疑和反驳，促使学生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断地思考、探索，逐渐发现自己的认知中存在的矛盾和错误，从而深入地思考问题，最终得出更加准确和深刻的结论。“产婆术”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他们不再被动地接受道德观念，而是主动地去思考和探索，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认同道德的价值。

(2) 柏拉图的“理想国”德育体系

柏拉图的德育思想以其宏伟的“理想国”构想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德育体系，犹如一座精心设计的大厦，各个部分相互关联、相互支撑，旨在培养出具有高尚品德和卓越才能的公民，以实现城邦的正义与和谐[2]。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社会被划分为三个阶层，分别是统治者、护卫者和生产者，每个阶层都肩负着独特的使命，同时也需要具备相应的美德。统治者，作为理想国的最高领导阶层，被视为智慧的象征，他们肩负着治理国家、引领社会发展的重任。在柏拉图看来，统治者必须具备卓越的智慧，这种智慧并非普通的知识，而是对理念世界中善的理念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只有真正领悟了善的理念，统治者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引导国家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为了培养统治者的智慧，柏拉图主张对他们进行长期而系统的教育。从幼年时期开始，统治者就需要接受严格的筛选和培养，学习各种知识，包括哲学、数学、辩证法等。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统治者深入探讨宇宙、人生的本质问题，培养对真理的追求和对事物本质的洞察力；数学的学习则有助于他们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和理性分析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事物之间的关系；辩证法的训练则让他们学会运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去

思考问题，能够在复杂的情况下辨别是非，做出正确的判断。通过这些教育，统治者逐渐成长为具有深邃智慧和广阔视野的领导者。

护卫者，作为国家的保卫者，其主要职责是捍卫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抵御外部的侵略和内部的叛乱。因此，勇敢成为了护卫者最为重要的美德。柏拉图认为，勇敢并非是简单的鲁莽和冲动，而是在面对危险和困难时，能够坚定地坚守正义，不畏惧、不退缩。为了培养护卫者的勇敢美德，柏拉图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教育和训练体系。从儿童时期开始，护卫者就接受军事训练，包括体能训练、战斗技能训练等。通过长期的体能训练，护卫者拥有强健的体魄，具备在战场上与敌人搏斗的能力；战斗技能训练则让他们掌握各种战斗技巧，提高战斗的效率和胜率。在训练过程中，护卫者还接受道德教育，培养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意识，使他们深刻认识到自己肩负的使命，从而在面对危险时，能够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战。

生产者，作为社会的基础阶层，他们负责从事生产劳动，为整个社会提供物质保障。对于生产者来说，节制是最为重要的美德。节制意味着生产者能够安于自己的本职工作，不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能够合理地控制自己的欲望，满足于通过辛勤劳动所获得的成果。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生产者需要遵循社会的分工，专注于自己的生产领域，为社会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他们不应过度追求财富和权力，而是要保持一种平和、稳定的心态，通过诚实劳动为社会做出贡献。为了培养生产者的节制美德，柏拉图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通过教育引导生产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从而自觉地遵守社会的道德规范。

柏拉图的“理想国”德育体系通过对不同阶层的德育规划，构建了一个全面、系统的道德教育框架。每个阶层的美德培养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共同为实现城邦的正义与和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德育体系不仅在古希腊时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也为后世的德育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3)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德育观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德育观犹如一把精准的标尺，为人们在道德实践中把握行为的度提供了明确的指引。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并非是极端的表現，而是在情感和行为上的适度状态，处于过度与不及之间的平衡位置。这种适度的美德，既避免了过度带来的弊端，又防止了不及所导致的不足，是实现个人幸福和社会和谐的关键。亚里士多德认为，“中道”并非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标准，而是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境和个人的实际情况来灵活把握^[3]。在不同的情况下，适度的行为表现可能会有所不同。在面对敌人的攻击时，勇敢的表现可能是坚决地抵抗；而在面对朋友的错误时，勇敢的表现则可能是真诚地指出并帮助其改正。为了培养人们的“中道”美德，亚里士多德强调实践和习惯的养成。人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践行“中道”的原则，通过实际行动来培养自己的道德习惯。在与他人交往中，学会尊重他人的意见，不过分自负也不过分自卑；在处理事情时，学会权衡利弊，不盲目冲动也不犹豫不决。通过长期的实践和积累，人们逐渐将“中道”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品质，从而在面对各种情况时，都能够自然而然地做出符合道德的行为。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德育观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性、平衡的道德准则，帮助人们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把握正确的行为方向。它不仅对古希腊社会的道德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为现代社会的道德教育和个人道德修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让人们在追求美德的道路上，更加注重适度与平衡，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3. 中国儒家传统德育思想解读

(一) 儒家德育思想核心理念

(1) “礼”的规范与约束

“礼”在儒家思想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宛如一张严密的大网，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社会交往以及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规范与约束作用。在日常生活中，“礼”体现为各种细致入微的礼仪和礼节，如见面时的行礼、用餐时的座次安排、穿着服饰的规范等。这些看似琐碎的礼仪，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道德意义，它们是人们表达尊重、展现修养的重要方式。在正式的社会场合中，见面时行拱手礼或鞠躬礼，能够表达对对方的敬意和友好；在用餐时，遵循座次的尊卑顺序，体现了对长辈和客人的尊重。这些礼仪不仅使人们的行为更加得体、优雅，还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在社会交往中，“礼”是维护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准则。它要求人们在与他人交往时，要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尊重他人的意愿和感受，做到言行举止得体。在与长辈交流时，要使用恭敬的语言，态度谦逊；在与朋友交往时，要诚实守信，互相帮助。“礼之用，和为贵”，通过遵循“礼”的规范，人们能够避免冲突和矛盾，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在国家治理层面，“礼”更是被视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保障。儒家主张通过“礼治”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认为统治者应该以“礼”为准则，治理国家，管理百姓。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整顿他们，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他们，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归服之心。这表明，“礼”的作用不仅仅是约束人们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能够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使人们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礼”对个人品德修养也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一个人只有通过学习和践行“礼”，才能在社会中立足，成为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人。“礼”能够培养人们的自律意识和自我约束能力，使人们在面对各种诱惑和挑战时，能够坚守道德底线，做出正确的选择。通过参加各种礼仪活动，人们能够逐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4]。

(2) “义”的价值导向

“义”在儒家思想中犹如一座明亮的灯塔，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导向，是衡量行为正当性的重要标准。它强调人们在面对各种选择时，要遵循道德原则，做出符合正义的行为。在儒家看来，“义”与“利”是相对的概念，“义”代表着道德、正义和公利，而“利”则往往与个人的私利相关。儒家主张“见利思义”，即在面对利益的诱惑时，要首先考虑是否符合道义。如果符合道义，就可以追求；如果违背道义，即使利益再大，也应该坚决放弃。

在《论语·里仁》中，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能够明白道义的重要性，并以此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而小人则只看重个人的利益，常常为了追求私利而不择手段。这体现了儒家对“义”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人们道德选择的引导。在面对金钱的诱惑时，君子会坚守道德底线，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获取财富；而小人则可能会为了谋取私利，不惜违法乱纪，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义”还体现在人们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上[5]。儒家倡导人们要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积极关心国家大事，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国家面临危难时，仁人志士们会挺身而出，舍生取义，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抗日战争时期，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英勇奋战，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行为就是“义”的生动体现。在人际交往中，“义”要求人们要讲信用、守承诺，做到言行一致。一个讲“义”的人，会在朋友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给予帮助和支持；会在面对不公正的事情时，勇敢地站出来，维护正义。在《论语·学而》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其中，“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就是强调在与朋友交往中要讲信用，这也是“义”在人际交往中的具体体现。

4. 古希腊与中国儒家传统德育思想的比较

(一) 古希腊与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契合性

(1) 重视道德教育的地位

古希腊与中国儒家传统德育思想皆将道德教育奉为主臬，视其为培育人才、稳固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在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在古希腊，柏拉图于《理想国》中明确指出，教育的核心使命在于塑造具备高尚品德与卓越智慧的公民，以实现城邦的正义与繁荣。在他精心构建的理想城邦中，不同阶层的公民皆需接受与之相适配的道德教育，从而确保各自能恪尽职守，共同推动城邦的和谐发展。哲学家阶层通过深入研习哲学，领悟善的理念，进而获得治理国家所需的智慧；护卫者阶层则着重培养勇敢、忠诚等品质，肩负起保卫城邦的重任；生产者阶层亦需秉持节制的美德，专心从事生产劳动，为城邦的物质基础提供坚实保障。这种对道德教育的高度重视，旨在使每个公民都能在城邦中找到自身的价值与定位，实现个人与城邦的完美融合。亚里士多德同样强调道德教育在个人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他认为通过系统的道德教育，人们能够培育出良好的道德习惯，进而实现幸福的人生。在他看来，幸福并非仅仅是物质的满足或感官的享受，而是一种基于道德实践和理性思考的精神境界。道德教育能够引导人们在面对各种选择时，做出符合道德准则的决策，从而实现自身的完善和幸福。

在中国，儒家传统德育思想更是将道德教育视为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途径。孔子曾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强调通过道德教育和礼仪规范的引导，能够使百姓不仅具备羞耻之心，更能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儒家的观念中，个人的道德修养是一切的基础，只有先修身，才能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若能在家庭中践行孝悌之道，尊敬长辈、关爱兄弟姐妹，那么他在社会中也更有可能成为一个有道德、有责任感的人，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仁政”的主张，认为统治者若能以道德为基础治理国家，关心百姓的福祉，便能赢得民心，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得民心者得天下”，而要得民心，就必须重视道德教育，培养百姓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习惯。统治者应以身作则，推行仁政，引导百姓向善，使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2) 追求道德的完善境界

二者不约而同地追求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境界，激励人们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不断砥砺前行，持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向着至善至美的目标迈进。

古希腊哲学家们以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等美德为核心，构建起了一个追求道德完善的理想体系。苏格拉底坚信“知识即美德”，他认为人们只有通过不懈地追求知识，深入洞察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才能真正领悟善的真谛，从而做出符合道德的行为。在他的眼中，一个拥有知识的人，必定能够明辨是非善恶，自觉地选择正确的道路，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为了探寻真理和美德，苏格拉底常常与他人展开激烈的对话，通过不断地质疑和反思，引导人们深入思考道德的本质和意义。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城邦，其中的公民各自具备相应的美德，共同致力于实现城邦的正义与和谐。哲学家作为城邦的统治者，需要具备卓越的智慧，以引领整个城邦走向正确的方向；护卫者则需拥有勇敢的品质，坚定地捍卫城邦的安全；生产者要秉持节制的美德，合理地控制自己的欲望，为城邦的物质生活提供保障。柏拉图认为，通过系统的教育和培养，人们能够逐渐具备这些美德，实现道德的完善。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中道”思想，为人们在追求道德完善的道路上提供了明确的指引。他认为，美德并非是非极端的表现，而是在情感和行为上的适度状态，处于过度与不及之间的平衡位置。勇敢是介于怯懦与鲁莽之间的中道，节制是介于放纵与禁欲之间的中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根据具体情境，灵活地把握“中道”，避免走向极端，从而实现道德的完善。

在中国，儒家以“仁”为核心，构建起了一个涵盖“仁、义、礼、智、信”等诸多道德规范的完善体系，倡导人们通过“修身”“自省”等方式，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以达到“圣人”的境界[6]。孔子一生都在追求“仁”的境界，他认为“仁”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他人的关爱和尊重，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他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从点滴小事做起，践行“仁”的理念，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通过不断地自我约束和自我提升，逐渐向“仁”的境界靠近。孟子提出“性善论”，认为每个人都天生具有“四端”之心，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们只需通过不断地扩充和培养这些善端，便能发展成为仁、义、礼、智四种美德，实现道德的完善。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能够不断地追求道德的提升，超越自我，成为一个有道德、有担当的人。

(3) 强调教育方法的引导性

古希腊与中国儒家传统德育思想均高度重视通过启发、引导的方式开展德育工作，坚决摒弃简单粗暴的灌输式教育，致力于充分激发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使其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道德学习与思考的过程中，从而实现道德的自我提升。

在古希腊，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堪称经典的启发式教育方法。他坚信知识并非是从外部强行灌输进入人的头脑中的，而是人们内心原本就潜藏着的，只是需要借助适当的引导和启发，才能将其挖掘出来。在与学生的对话中，苏格拉底通常会以一个看似普通的问题作为切入点，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当学生给出自己的答案后，他并不会直接给出正确与否的判断，而是通过进一步的提问，对学生的回答进行质疑和反驳，促使学生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发现其中存在的矛盾和漏洞。在这个反复思考和探索的过程中，学生逐渐培养起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的能力，深入地理解和领悟道德的内涵。

在中国，儒家也极为注重通过启发式的教育方法引导学生领悟道德的真谛。孔子倡导“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强调只有当学生处于积极思考、渴望求知的状态时，教师才应适时地给予启发和引导。在教学过程中，孔子善于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和案例，引导学生理解抽象的道德概念。在讲解“仁”的概念时，孔子会举例说明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关爱他人、帮助他人，让学生从具体的事例中体会“仁”的内涵。儒家还注重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引导学生。孔子本人以身作则，以自己的高尚品德和言行举止为学生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一生践行“仁”的理念，无论是在政治生涯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始终坚守道德底线，关爱他人，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的学生们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深受感染，纷纷以他为榜样，努力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

(二) 古希腊与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差异性

(1) 德育目标的差异

古希腊德育目标侧重于培育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卓越智慧与高尚品德的公民，以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与城邦的繁荣昌盛。在古希腊城邦中，公民广泛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这就要求他们具备敏锐的思维能力、准确的判断力和良好的表达能力，以便在公共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通过教育培养出哲学家、护卫者和生产者三个阶层，分别具备智慧、勇敢和节制的美德，共同构建正义的城邦。这种德育目标强调个体的理性发展和对知识的追求，使公民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做出明智的决策，为城邦的发展贡献力量。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理性和道德品质，使人们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他强调通过实践和经验的积累，培养公民的各种美德，如勇敢、节制、正义等，使他们能够在不同的情境中做出恰当的行为。在古希腊，体育竞技不仅是身体的锻炼，更是培养公民勇敢、坚韧和竞争精神的重要途径。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等赛事中，运动员们通过挑战自我、超越极限，展现出卓越的个人品质，为城邦赢得荣誉。

中国儒家传统德育目标则以培养“仁人君子”为核心，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使其能够遵循社

会伦理规范,实现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7]。儒家认为,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只有每个人都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社会才能稳定有序。孔子倡导“克己复礼”,要求人们克制自己的私欲,遵循礼的规范,以达到“仁”的境界。在儒家的观念中,“仁”是最高的道德准则,体现为对他人的关爱、尊重和包容。孟子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将个人的修身作为实现社会理想的起点。通过修身,培养个人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进而影响家庭、社会和国家。在儒家的教育体系中,强调通过学习经典、践行礼仪等方式,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习惯。在家庭中,子女要孝顺父母、尊敬长辈,通过践行孝道,培养感恩之心和家庭责任感;在社会中,人们要遵守社会规范,尊重他人,与他人和谐相处,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2) 德育方法的特色

古希腊德育方法以逻辑推理、辩证法以及对话式教学为显著特色,注重激发学生的思维活力,引导学生通过自主思考和辩论,探索道德的真谛。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堪称这一方法的典范,他通过与学生的对话,不断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使学生在自我反思和辩论中,逐渐发现自己的认知误区,从而获得知识和道德的提升。通过对各种观点的分析和批判,帮助学生形成对正义的正确理解。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强调了辩证法的重要性,他认为通过辩证法的训练,学生能够超越感性认识,达到对理念世界的理性把握,从而获得真正的知识和智慧。在柏拉图的学园中,学生们经常进行激烈的辩论和讨论,通过思想的碰撞,深化对道德和哲学问题的理解。亚里士多德则注重实践和经验在德育中的作用,他认为道德品质的形成不仅需要理论知识的学习,更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来培养[8]。

中国儒家传统德育方法则以因材施教、榜样示范、自我修养等为主要特点,注重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引导。孔子是因材施教的倡导者,他善于观察学生的性格、兴趣和才能,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对于性格急躁的子路,孔子会教导他要稳重、冷静;对于性格谦逊的冉求,孔子则鼓励他要积极进取。榜样示范在儒家德育中也具有重要地位,儒家强调教师和家长要以身作则,以自己的高尚品德和行为为学生树立榜样。孔子本人就是学生们的榜样,他一生践行“仁”的理念,无论是在政治生涯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始终坚守道德底线,关爱他人,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的学生们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深受感染,纷纷以他为榜样,努力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

5. 结论

古希腊与中国儒家传统德育思想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精神遗产,不仅为东西方思想体系与教育实践奠定了核心根基,其蕴含的德育智慧更对当代道德教育具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通过系统性对比可明确:二者在德育价值认知、目标追求与方法逻辑上既存在共通性,也呈现出鲜明的文化差异性,而这些特质正是构建当代德育实践路径的重要思想源头。

从共通性来看,二者均将道德教育置于社会发展与个体成长的核心地位,认为德育是实现“人才培养-社会秩序稳固”双向目标的关键纽带;均以“道德完善”为终极追求,鼓励个体通过持续修养突破自身局限,实现精神境界的提升;均强调教育方法的“引导性”而非“灌输性”,注重激发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这些共识为当代德育确立“以人为本、价值引领”的基本方向提供了历史依据。从差异性来看,二者的核心特质为当代德育的“多元化实践”提供了互补性资源:在德育目标上,古希腊以“城邦共同体”为出发点,聚焦于培养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理性智慧与公共责任感的公民,其目标指向“个人全面发展与城邦繁荣的统一”;中国儒家则以“家国同构”为逻辑起点,以培养“仁人君子”为核心,强调通过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实现“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递进式目标。在德育方法上,古希腊依托逻辑推理、辩证法与对话式教学,构建了以“思维激活”为核心的教育路径;中国儒

家则通过因材施教、榜样示范、自我修养等方法,形成了以“个性适配与内在觉悟”为特色的教育体系。

基于对古希腊与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剖析和对比,为当代德育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启示。一、在学校德育内容构建上:以“理性思维+人文关怀”实现内容升级。古希腊德育对“理性智慧”的重视,启示当代学校德育需增设哲学、逻辑学等课程,通过系统训练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理性分析能力——这一举措的直接目的,是回应古希腊“公民需以理性参与公共生活”的德育目标,解决当代学生面对复杂信息时“判断力不足”的现实问题。同时,儒家“仁”“礼”思想中蕴含的人文关怀,可融入品德教育课程,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人际交往认知与社会责任意识——这既是对儒家“培养仁人君子”目标的当代转化,也能弥补单纯强调理性可能导致的“情感冷漠”问题,实现“理性与情感”的平衡发展[9]。二、在学校德育方法创新上:以“讨论式教学+情境化引导”激活学生主体性。古希腊“对话式教学”注重通过平等讨论激发思维活力,这一方法可直接转化为当代课堂中的“议题式讨论”“辩论赛”等形式,让学生在观点碰撞中深化对道德问题的理解——其逻辑核心是延续古希腊“以引导代替灌输”的教育理念,解决传统德育“单向说教”导致的学生参与度低的问题。儒家“因材施教”“榜样示范”的方法,则可转化为“情境化德育”实践:例如根据学生的性格特质设计不同的道德实践任务,同时选取符合“仁”“义”标准的当代榜样,通过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方式引导学生内化道德准则——这一设计既呼应了儒家“因人而异、以榜样启觉悟”的教育逻辑,也能提升德育的针对性与感染力。三、在社会道德建设上:以“传统美德+现代转化”构建社会道德体系。古希腊对“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四大美德的强调,与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观,共同构成了当代公民道德准则的思想源头[10]。例如,面对社会公共事务中的道德困境,如公共资源分配、网络信息伦理,古希腊“正义”“节制”美德可为公民提供“理性判断、克制私欲”的行为指引;儒家“信”“义”思想则可规范人际交往中的诚信行为,解决当代社会“信任缺失”的现实问题。此外,儒家“家国情怀”与古希腊“公民友爱”观念的融合,可通过文化教育活动、媒体传播等形式,转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价值认同——这一过程既传承了东西方传统德育的核心精神,又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增强社会凝聚力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

总之,古希腊与中国儒家传统德育思想的异同点,并非单纯的历史文化现象,而是具有现实生命力的思想资源。二者的德育智慧可有效为当代教育与社会道德建设提供指引,为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道德主体、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提供重要支撑。

参考文献

- [1] 魏淑民. 儒者之刑名: 清代省例立法基础的再思考——基于儒家元典对《福建省例》的文本解读[J]. 史学月刊, 2020(9): 72-78.
- [2] 朱镜人, 方燕雯. 古希腊雅典的德育陶冶方式及现代价值[J].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20(1): 45-49.
- [3] 田芬. 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德性之思[J]. 大学(研究版), 2020(3): 88-95.
- [4] 李申申, 常顺利. 儒家道德教育具身性的当代阐释[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4): 82-93.
- [5] 冯昊青, 贺凯杰. 儒家传统“即身德育”思想及其教化路径[J]. 齐鲁学刊, 2024(2): 15-23.
- [6] 肖潇, 李建华. 先秦儒家“仁近于乐”释义及其德育价值[J]. 现代大学教育, 2024, 40(6): 65-73.
- [7] 张雅珊. 中西方德育模式的对比: 起源与历程[C]//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 2024 高等教育教学研讨会论文集(上册). 济南: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2024: 3.
- [8] 张艳, 易连云. 现代德育归于何处——先秦的圣人与古希腊的智者之比较[J]. 江苏教育研究, 2010(13): 3-6.
- [9] 陈霄鹏, 范雨泽. 坚持德育首要地位, 强化德育标准化管理[J]. 中国标准化, 2025(2): 209-211.
- [10] 焦妙丽. 新时代学校德育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4(8): 45-47.